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六期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1c)

【旧案新说】	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阎明复
【事件解析】	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 ——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	余汝信
【读书札记】	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	丁凯文
【人物春秋】	猛士悲歌唱大风——读《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丁凯文
【书刊评论】	革命？还是帝王政治的回光返照？ ——Mao's Last Revolution 评介	董国强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旧案新说】

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 阎明复 •

今年7月，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托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

顾大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上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又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要职，在华工作长达12年，曾亲历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以及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

1957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我和古达舍夫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青的苏联人，特意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顾

大寿”。我与顾大寿从那时相识后，又多次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

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难忘的中国生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波作了客观真实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和名人轶事。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9·13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71年，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传说中共内部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免去了一切职务，最后死在开封市的一所牢房里。邓小平和中共其他的高层领导人被放逐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同时，国防部长林彪成为中国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挑选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点写在中共党章中。可是，林彪不只一次地向毛泽东建议恢复中国国家主席的职位，对此，领袖的反应极其否定。

“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对林彪的信任。不仅如此，毛泽东已经考虑，如何结束‘文化革命’。因此，他秘密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以便实地了解情况，在同各军区领导人吹风时，他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统一的必要性，林彪和他的拥护者，包括当时担任高官的林彪的夫人叶群，他的儿子林立果，力图篡权并分裂中央。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他的拥护者在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暴露后，企图逃跑。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были сбиты）。这就是所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我喜欢乘坐火车，因为从车厢的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景色，比坐飞机安全多了。而从飞机的窗子里只能看见天空。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都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于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死者中有一位妇女，她可能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巴兰诺夫将军给我们看了死者的照片，照片和烧焦的遗体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随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莫斯科发来电报，允许把估计是林彪的头颅以及部分有研究价值的飞机残片送去，其他的死者和飞机的残骸又重新埋起来。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的武官

派了专人，把林彪的头颅和部分飞机零件运到莫斯科。

完成任务后，我和我的两位同志依旧乘坐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后来听说，林彪的头颅很快送到莫斯科，苏联有关机构做了牙齿鉴定，很快就得出了结果，证实这些牙齿是属于林彪的。至于说为什么林彪要叛逃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飞机的坠落和爆炸。莫斯科没有给我们任何说明。新华社也没有发表任何材料。

过了一个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讲述了林彪的叛逃经过，然后《通知》又作为正式文件在党外、在居民当中进行传达。其中指出，林彪伪装并欺骗了毛泽东，命令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成立了一个小‘舰队’，想要实现‘571工程’，策划政变，夺取政权，甚至于想要杀死毛泽东。至于说为什么逃亡国外或叛变，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说他企图出卖祖国，并在准备在自己今后的破坏活动中依靠苏联。这加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和领袖的热爱，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中国人民被林彪的行为激怒了。

在北京，我不只一次地亲耳听到对林彪反党行为的谴责。

当年林彪曾在苏联学习，并表现出了军事才能。这一点斯大林特别指出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普通的人。林彪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喜欢讲话。毛泽东看中林彪。还在1955年授予他元帅军衔。在中国的10位元勋中，他是最年轻的。1958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统帅三军武装力量。

1959年，当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活动时，在北京机场上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了仪仗队。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人当中他排第五位。‘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接替了刘少奇，成为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当时毛泽东被称为最高统帅，他被称为副统帅以及毛泽东最可靠的接班人。他如此迅速地高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当时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林彪会在异国他乡，在沙漠中如此悲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9·13事件”过去已经近30年了，至今似乎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 《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事件解析】

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
——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

• 余汝信 •

今年第十期《炎黄春秋》，刊载了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转述了前苏联外交官顾达寿2008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中有关“九一三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由于阎明复的声望，更由于回

忆录声称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以及“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

阎明复认为，“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而笔者则认为，顾达寿的多处说法均很有疑问，以至令人怀疑，顾是否真的到过现场？以下，为笔者对顾所说逐段进行的一些推敲，然否，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顾达寿其人及其信息来源

顾达寿，当时中国官方和新华社公布的姓名全称译法为利萨特·沙拉福吉诺维奇·顾达寿。不知为什么，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官方翻译且应熟知苏方人物译名的阎明复，要将其另译为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音译古达舍夫亦错，应为库达舍夫），并为其另取了一个“中文名‘顾大寿’”？

按顾达寿自己的说法，1951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派赴中长铁路任翻译，之后调任苏驻华外交机构，前后在中国常驻工作了二十年（期间曾返国工作），曾任苏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多次陪同赫鲁晓夫、柯西金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根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名册，顾达寿1950年代中后期为苏驻华使馆随员，1960年代为使馆二秘，1971年至1973年为使馆参赞，1973年离任。1971年“九一三”前后，苏驻华大使为托尔斯季科夫（同样不知为什么，阎明复要将这一为人熟知的中文译名改为“托尔斯基科夫”），公使衔参赞萨福隆诺夫，与顾达寿同为参赞、任职时间比顾早的有包达宾科、罗加乔夫、伊凡诺夫和邱赫罗夫四人。

笔者之所以要将顾达寿的简历介绍得详尽一些，是为了说明，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尤其是中国有关方面曾经判断，他并没有克格勃的背景），换言之，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渠道。顾达寿并没有披露他的信息来源。根据顾的地位，他要是从官方（无论是苏联官方或是蒙古官方）得到的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一切信息，苏联驻华大使、公使衔参赞以及其他与顾同一级别的参赞、武官同样可以得到。苏联驻蒙古使馆的大使、参赞，驻蒙苏军中高层军官，莫斯科苏联外交部与顾级别不相上下的其他官员，苏联克格勃有关人员，蒙古方面的有关相当级别的官员，亦同样可以知悉256号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事隔三十八年，苏联早已解体，蒙古早已变色，一切对俄罗斯、蒙古官方已不存在什么保密必要的情况下，这些仅对中国人还算是敏感的信息，只是由当时官阶并不算高、信息来源并不特殊的顾达寿一人以私人回忆录的形式加以披露？而如果这一信息仅是来源于顾自己的推测而非官方渠道，它会有任何史料价值吗？

二、顾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余注：原文如此），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余注：阎文此处有一不可译的俄文单词，疑为转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1、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力及防空力量

顾以上全句话的语意，明显是指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蒙古军方雷达所发现，蒙方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侦察机击落。

我们首先要问，当时蒙古的军力特别是防空力量究竟如何？

据孙一先称，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页91）

孙一先的说法部分准确，部分比实际情况有所夸大。据同一时期的中国官方判断，蒙军总兵力为三点五万人，与本文有关的防空力量方面，有一个高炮营，一个火箭营（即孙一先所说的防空导弹营），一个雷达营。同时期蒙军并没有作战飞机，其航空局仅有三个运输大队，一个通讯大队，人数两千人。

至1970年代中，蒙军在防空力量方面除将雷达营扩充为雷达团外，其余没有变化（仍然未有作战飞机）。防空兵力部署：高炮营、火箭营配置在首都乌兰巴托周边地区，其他各省并没有防空作战部队部署。雷达团（065部队）团部位于乌兰巴托，该团九个雷达连，一至八连沿中蒙边境纵深布防，一连驻东方省马塔特，二连驻苏赫巴特尔省巴音德勒格尔，三连驻东戈壁省呼布斯格尔，四连驻前杭爱省阿尔拜赫雷，五连驻戈壁阿尔泰省德勒格尔，六连驻南戈壁省朝克图车其，七连驻科布多省阿尔泰，八连驻戈壁阿尔泰省扎呼伊，另九连（直属连）驻首都乌兰巴托。本文假设1971年蒙军雷达部队的部署等同于以上部署（按一般规律而言，事实上应弱于以上部署）。

2、蒙军能将256号飞机当作是侦察机打下来吗？

256号飞机9月13日零时32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经河北迁安、承德，内蒙多伦等地上空进入蒙古（据康庭梓），越过中蒙边界时间为凌晨1时55分，其飞行航线途经蒙军雷达团一连与二连之间（较接近二连）的苏赫巴特尔省上空，再进入肯特省，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110°15′，北纬47°42′）坠毁。

首先一个问题是，当256号飞机低空飞行进入苏赫巴特尔省上空时，一连与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是否发现了目标？笔者认为，可能性是50：50。当时，距中苏边境冲突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中蒙之间并没有军事对峙的态势，此前一个月，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已经到任，解决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标志着中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在大漠那边》，页161）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又是星期天之后的凌晨两点人最困的时候，256号飞机又是避开雷达低空飞行，蒙军的雷达没有发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蒙军一连、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是否会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的侦察机？答案是这样的误判机会微乎其微。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地区并非对方军事战略要地，并没有什么军事侦察价值，蒙军应很清楚，中国军方从来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尤其是夜间的侦察行动。而且，中国军方当时的空中侦察手段落后，用作侦察用途的大不了是比三叉戟体量小得多的歼侦6，这一点蒙方应该心知肚明，从雷达图象中就可以判断，这样大型的喷气式飞机，不可能是中国的军用侦察机，中国军方没有这样大型的侦察机。如蒙军雷达真的发现了256号飞机，最大的可能性是感到困惑而不知所措。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蒙军的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并误判为中方侦察机，蒙军有能力将其击落吗？答案是否定的。蒙军的防空作战力量全部集中于乌兰巴托周边地区，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均无配置高炮或防空导弹，蒙方又无作战飞机，如蒙军发现了256号飞机，充其

量只能通报上级雷达团团部以起预警作用，它有什么办法能打下这架飞机？

3、256号飞机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

那么，256号飞机有没有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因为顾达寿的回忆录没有这样的说法，本文原可不作这一可能性的讨论，但为解部分读者之惑，讨论一下也无妨。

有关驻蒙苏军的空军和防空实力，孙一先称：“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在大漠那边》，页91）

孙一先的说法还是有些夸大。据更权威的中国官方掌握的苏军资料显示，同时期苏军在蒙仅驻有一个歼击机师，两个轰炸机大队，飞机230架，归驻苏联境内赤塔的前线航空兵第23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两个轰炸机大队驻纳莱哈，三个歼击机团分别驻巴彦、乔巴山和苏木布尔，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驻苏木布尔。主要装备的机型，轰炸机为伊尔-28，歼击机为米格-17、米格-19和少量米格-21，运输机为米-4、米-6和米-8。驻蒙苏军只有一个雷达团（辖七个连），团部在乌兰巴托以北，雷达连部署于蒙古中部腹地，其中一连位于沙音山达，二连位于苏木布尔，三连位于温都尔汗，四连位于曼德勒戈壁，五连位于乔巴山，六连位于纳莱哈，七连位于恩格尔山达。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旅部署。

驻蒙苏军的整体态势，如孙一先所称：“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在大漠那边》，页92）笔者认为，驻蒙苏军处在战略防御的二、三线位置，当时的中苏局势又较缓和，部队并不在24小时戒备状态。即使蒙方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这是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首先要报告雷达团，团部是否能在凌晨2时时分即时通知远在赤塔的驻蒙苏军空军指挥中心，苏方又是否能及时反应，命令部署在巴彦、乔巴山、苏木布尔三地歼击机拦截，是大有疑问的。笔者还认为，即使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部队，亦应部署在铁路沿线各军事要地及机场周边。以“萨姆-3”地空导弹最大射程30公里、“萨姆-2”最大射程54公里计，远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上空的256号飞机，对它们来说也是鞭长莫及。

三、顾称：“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1、蒙古方面并没有“立即”给中国驻蒙大使馆发出照会，后来也没有。据孙一先称，蒙古方面得知256号飞机坠毁后，于9月14日清晨打电话给中国使馆，称蒙古副外长上午8时30分要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大使在蒙外交部停留了45分钟，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只是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了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在大漠那边》，页164—165）在双方人员视察了飞机失事现场之后，9月29日，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国飞机在肯特省“由于不明原因坠毁”的消息。消息发布前，蒙方向许文益大使打了招呼，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般的报纸消息。”（《在大漠那边》，页272）

2、苏联在蒙古驻有大使馆，为什么蒙古方面会避近就远，将这件事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而

不是驻蒙使馆通知苏联方面？

3、同样，“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为什么不是委托就近的苏联驻蒙使馆，而是通知远隔千里的苏联驻华使馆“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四、顾称：“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

1、阎明复称，顾“详细记述了1971年‘9·13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很有些言过其实。顾的俄文版原书仅有160页，记载了他二十年的经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详细，以上这段话就很不详细。托尔斯基科夫究竟是什么时候派顾达寿去蒙古的？苏联外交部是什么时候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的？在顾的原书中都没有交待。

2、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1〕57号文发出林彪已出逃的通知，通知范围为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9月28日，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军队军、师（空军到团），地方传达到地、市委、市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传达到处室负责人。10月24日，扩大传达至“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其间，9月23日，中方向蒙方提出运回死者遗体、交还死者遗物的要求，蒙方采取拖延答复的态度。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在大漠那边》，页271）

笔者认为，苏、蒙方面揣测到失事飞机上的是林彪，应在10月1日中国破天荒地不像往年般举行庆祝游行，领导人不上天安门之后。顾如真的有蒙古一行，也应是10月份的事。

3、顾被派去蒙古一行的原因十分牵强。顾并不是什么痕迹专家，以他自己下文中的说法，“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他的任务（如果有的话）并没有完成。

五、顾称：“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

1、顾说的以上第一句话就很奇怪，难道外交官不坐火车坐飞机就会引起驻在国的不满？事实上当时中蒙之间的飞机航班早已停航（《在大漠那边》，页237），到蒙古就只能坐火车。

2、“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难道也可以说是“详细记述”？第3、4次国际特快列车，每周对开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方向列车在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作一小时停留后，蒙古境内的首站即为乌兰巴托，从北京至乌兰巴托之间行驶约三十个小时，这些在孙一先的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而顾则欠奉。

3、对“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笔者甚有疑问。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名册，同时期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为伊凡诺夫上校，副武官为瓦尔瓦利奇少校。自1967年后，苏驻华武官均为上校军衔。1970年代后期苏驻蒙大使馆武官为赫罗莫夫中校，以此推测，1971年苏驻蒙大使馆武官应仅为中校至多上校而非一位将军。

4、“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我们”是些什么人？仅仅就是顾达寿等三人？下了火车后

用什么交通工具送抵目的地？要知道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飞机飞行时间都要一个小时！林彪坠机的地点中国人才称“温都尔汗地区”，蒙方称为“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距离温都尔汗（肯特省的省会）还有两小时的车程（70公里的沙土公路及草原小道），顾达寿到的到底是温都尔汗还是依德尔莫格县？

六、顾说：“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

1、“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顾的全文就数这句话最有意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顾到底到过现场没有。而据9月15日即到达失事现场的孙一先称：“从这块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在大漠那边》，页187）

2、这么多的飞机残骸都能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有必要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据当时看着蒙古士兵挖坑、自己也参加填土的孙一先称，大坑中只有九具棺木，而决没有飞机残骸：“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坑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土后代移棺下葬。……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锹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锹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在大漠那边》，页209）

3、10月的蒙古，已是深秋，从照片可以看到，9月中旬到现场的中蒙人员都已穿上了大衣，为什么顾还说天气“炎热”？另死者的尸体是装殓在棺木中下葬的，并不是直接埋在沙里的。顾的所说，句句都使人对其诚实度充满疑惑。

七、顾称：“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

9月15日、16日在飞机失事现场的中蒙人员众多。中方的许文益大使在战争年代是一位军人（曾任丁盛手下一三五师四〇三团副政委），据笔者判断孙一先也是一位军人（后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团长，《在大漠那边》第一页就是他的军装照片）。蒙方参加视察现场活动的有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事务局的官员，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军人中有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肯特省边防和内务军事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嘎勒中校等，此外还有法医莫尤。他们都没有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什么弹孔，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曾遭枪击的痕迹，顾达寿的弹孔说可信吗？

八、顾称：“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

1、孙一先称，尸体是编了号按顺序装殓入棺木内下葬的，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在大漠那边》，页209）顾达寿自始至终没有提棺木事，更没有提“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在大漠那边》，页209）

2、关于尸体，孙一先称：“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死者中有两个剩有上衣，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第2号尸体“皮肤烧灼不重”，第3号尸体“皮肤烧灼较轻”，第5号尸体“皮肤烧灼不

重”，第4号尸体“上身穿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而并非如顾所说“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

九、顾称：“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

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

1、如果顾真的到过现场，他也许就不会说“哪些残骸”而应该说“哪一具棺木里的尸体”是林彪的。而一一开棺之后，以尸体的体态特征——“个子瘦小”、“秃顶”及面部轮廓，并不难判断，第5号尸体就是林彪。顾真的到过现场吗？！

2、“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解。

3、林彪什么时候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中共高级将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有刘伯承、左权、刘亚楼和杨至诚，没有林彪。光凭这一句话，也略可窥见顾达寿这位“汉学家”的中国现代史水平。

（2009年10月）

~~~~~

#### 【读书札记】

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

• 丁凯文 •

友人发来了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上阎明复的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这是阎明复摘译的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顾大寿（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的回忆《我的中国生涯》之一小部分。顾大寿在回忆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特别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因为顾大寿曾亲赴蒙古温都尔汗实地查看过飞机失事地点，故他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阎明复的眼光极为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该回忆里十分重要的一点——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如何坠毁的。顾大寿的回忆直指林彪的座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阎明复特别将“击落”一词的俄文标示出来，以示郑重。

林彪的座机之所以失事，到底是因为燃油耗尽而不得不迫降，还是遭遇了外部炮火的攻击而导致最终的坠毁。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林彪事件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和文革爱好者投入很大的精力予以辨析、研究。有些研究者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陈晓宁和京城孤魂二位。曾经抵达“九一三事件”失事现场勘察的前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曾于2001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指明，中方通过对飞机失事现场部分照片的分析，得出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论。顾大寿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这一谜底，林彪的座机确实是被外部炮火击中而导致最终的坠毁。

顾大寿的回忆虽然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底，但是却使我们产生了其他的疑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林彪的座机是怎样被击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炮火击中了林彪的座机？是地面高射

炮火，还是导弹、抑或是歼击机炮火所击中？顾大寿的回忆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另外，击落林彪座机到底是蒙古方面所为还是前苏联驻蒙古军队所为？顾大寿的回忆亦未曾提及。以常识而论，当时前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蒙古国早已是前苏联的傀儡，其军事防务也由苏联人控制，主要战略性武器也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如果说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被炮火击中，更大的可能性应是前苏联人所为，这样似乎更合乎情理，更何况苏联军方人员最先抵达出事现场，并拿走了一部分物品。若非他们所为，何以行动如此之快呢？

（2）顾大寿亲临“九一三事件”现场进行了观察，他的回忆是：“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顾大寿的回忆中并未给出他们赶赴出事地点的具体时间，根据中方孙一先的回忆，中方人员是在9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两次抵达出事地点，不仅勘察了出事飞机的残骸，还参与处理了罹难者的遗体，并加以安葬。印证顾大寿的回忆，顾大寿到达失事现场应在中方人员勘察之后，否则就不会“什么也没看见”了。我们可以推测，最先抵达出事现场的前苏联军方人员只对飞机本身和飞机上的相关文件感兴趣，所以他们拆走了一台尚为完好的飞机发动机，也许还有飞机的黑匣子。那么这些苏方人员还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之中有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呢？

（3）根据前苏联方面的报道，苏联人在9月某日重返飞机失事现场，重新对罹难者的遗体作了鉴定，原因是他们可能意识到飞机上遇难者中有中国方面的“大官”。据顾大寿回忆，他见到了那些重新被挖掘出来的遗体，但因为难以辨识，只好请示上级机关，在得到答复后，将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作进一步的鉴定，随后再将死者遗骸重新掩埋起来。最后通过鉴定，在莫斯科得出林彪确实死于飞机坠毁事件的结论。从顾大寿的回忆来看，顾大寿应属于第二批抵达失事现场的苏方人员，并非在第一时间勘察了该事件，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飞机失事现场的真实情况。

（4）另据顾大寿的回忆“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这一说法十分令人疑惑。首先，孙一先的回忆里未曾提及飞机上发现弹孔。以中方当时与苏蒙关系的状况，中方有理由怀疑有关飞机是被炮火击中而导致坠毁。孙一先在自己的回忆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失事飞机的勘察过程，并注意到机翼某处的大洞，大洞的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有向外翻的，有向内翻的。因此，孙一先怀疑此洞很像是地空导弹打的。然而，经过中方如此认真、仔细的勘察，中方人员竟然没有发现机舱舱壁上的弹孔，这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第二，林彪飞机上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带枪，其他人员除林彪、叶群外，就是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三位机械师和林彪坐车司机大杨，他们都不太可能随身佩戴枪支。如果机内真的发生了开枪事件，难道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开的枪吗？三叉戟飞机是全封闭的，林立果和刘沛丰也不可能在飞机内向飞机外开枪，他们要射击什么人或物体吗？虽然也不排除他们开枪威胁、恫吓机组成员。第三，据孙一先回忆，经过认真地勘察，中方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机内搏斗的迹象。事实上罹难者遗体的排列也不支持机内搏斗的说法。此点可参考袁策祥文章《“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载《百年林彪》）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罹难者的遗体上均未发现弹孔，这么狭小的飞机机舱内如果真的发生了搏斗，且使用了武器，难道所有机上人员都可以幸免于难吗？所以，所谓飞机上“发生搏斗，且使用武器”这一说法十分可疑，还有待更可靠的资料问世才能厘清真相，如黑匣子的出现。

（5）据孙一先的回忆，9月16日和17日这短短的两天内，中蒙双方进行了5轮会谈，而会谈的焦点是该失事飞机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蒙方认为飞机由于不明原因试图着陆，从而发生爆炸，并强调该机属于军用飞机。中方则强调该机乃中国民航飞机，因迷航而误入蒙古，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实际上中方在谈判时就已经意识到蒙方的意图，即“目的无非是为

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可借此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蒙方在交涉中的态度，他们心里很清楚是他们击落了该架飞机，如果他们承认那是一架民航客机，他们的责任就极为重大了，所以他们采取的那种态度毫不为奇。问题在于中方为何在后来迅速、主动地配合了蒙方，不经过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就自己宣称该机属“自行坠毁”呢？这就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林彪的态度与方针政策了。

中国官方在“九一三事件”后仅仅5天，即1971年9月18日，就发布了57号文件，该文件称：“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发布这份文件时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等人尚未回国汇报勘察飞机坠毁事件的全过程。这个匆忙发布的文件也丝毫未涉及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并未了解清楚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一结论已经明确宣告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的真实态度和处理该事件的方针政策。

9月21日孙一先从蒙古赶回北京向中央作汇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并听取孙的汇报。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失事飞机丝毫不感兴趣，竟然“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而听到汇报有关飞机上死难者情况时却表现出“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这说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最关注的是飞机上有没有留下活口，会否给中方造成什么麻烦。至于飞机为何飞往蒙古以及如何失事的，则根本不是中共高层关注的事情了。无论是自行坠毁还是被炮火击中都无所谓了，反正林彪已死，及早下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政治结论即可。孙一先汇报中提及的飞机机翼上的大洞也不在考虑之内了。在听取孙一先汇报不久，周恩来迅速得出了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周恩来的结论实际上配合了几天前中央对林彪事件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虽然日后中央又组织一些空军人士组成调查组，对照失事现场的照片和国内三叉戟飞机的原形作调查，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为周恩来的结论作注脚而已。

中共官方这一“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是全人类空难史上最不严肃的结论，在没有任何飞行专家现场调查、检验的情况下，只凭若干张照片，就由中共最高层拍板定论，实在太过荒唐、荒谬。据孙一先回忆，9月23日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向蒙方通报了中方的态度，原本突然强硬起来的蒙方代表听了中方“自行坠毁”的结论后态度明显软化。最后中蒙双方在索还遗体、遗物一事上竟然也不了了之。虽然，蒙方知道苏联人第二次到达失事现场取走了某些物品而为此故意设下障碍，阻挠中方索还遗体、遗物的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如果在一开始就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设法搞清飞机失事真相，而不是匆匆忙忙下结论在先、敷衍了事的作调查在后，那么蒙方很难隐瞒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由此可见，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在意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稳固，以及如何让死去的林彪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的罪责。至于孙一先等人日后沾沾自喜地吹嘘周恩来如何将“国际问题”轻易地转化为“国内问题”是多么多么睿智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

(2009.10.15)

~~~~~

【人物春秋】

猛士悲歌唱大风——读《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 丁凯文 •

丁盛将军去世至今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丁盛将军蒙受不白之冤也足足32年矣。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但人们心头的记忆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泯灭。2008年8月份香港出版了丁盛将军的回忆录——《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读罢此书，尤感到随着将军的自述

回到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回到那动乱不堪的文革时代，回到那不公不义且持续至今的邓氏年代。几多悲愤、几多感慨，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大胆将军”

1930年，年仅16岁的丁盛就参加了红军，从此与军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铸造了丁盛一生的辉煌战绩。丁盛参加了江西苏区的反围剿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参加了中共党的“七大”。在解放战争年代，丁盛不仅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还参加了衡宝战役，直到全中国的解放。丁盛从一名普通的战士，一步一个脚印，经过多年的艰苦征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的军长。几个最著名的战斗中，丁盛都身先士卒，勇猛冲杀，克敌致胜，军史标名。如遵义会议前红军攻打娄山关，丁盛身为连指导员，面对强敌猛打猛冲，夺取了战斗的胜利。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丁盛率领东北野战军二十四师参加辽西会战，全歼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由此确保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在随后的平津战役中，丁盛率领改编后的一三五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攻陷天津的城门，占领金汤桥，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通令嘉奖。最值得一提的是，丁盛在衡宝战役中，率其部孤军深入敌人的后方，以区区一个师的部队勇猛穿插，愈战愈强，切断了广西地区敌人的退路，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丁盛由此受到解放军四野的传令嘉奖和表扬。可以说，在历次战斗中丁盛总是表现出勇猛、机智、顽强的作风，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甚至能在敌我形势中暂时处于不利的条件下，及时掌握主动，表现出一个优秀的战时指挥员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化险为夷的可贵的素质和精神。正是由于丁盛的卓越战绩，人送雅号：“大胆将军”。用“叱咤风云、威震敌胆”来形容丁盛将军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丁盛在自己的回忆中将些战斗娓娓道来，无娇饰、无吹嘘，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讲述那段可歌可泣的非凡经历。唯一有些让人感到的不足之处是，丁盛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1959年的西藏平叛战斗和1962年11月指挥的中印边界战斗。这两次用兵之时都成立了以丁盛命名的指挥所——“丁指”，尤其是对印作战，中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与丁盛沉着、大胆、机智的指挥是密不可分的，也是丁盛战斗生涯中一段辉煌的经历。好在书中的附录部分录有齐心整理的《丁指部队的西藏平叛作战》和丁盛的战斗报告《关于中印边境部分地区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报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丁盛将军回忆中还有一些值得人们注意史实。一是中央苏区乱杀“AB团”，冤杀了很多无辜之人，且杀人手段异常残忍，排长、连长、团长，甚至师长也被冤杀掉，乃至部队减员很多，直接导致战斗力下降。丁盛回忆说：“现在想起来，还痛心，还难过。哪怕和敌人拼，死了也认了，却都死在自己人手里。”事实上，“AB团”事件长久以来就是一段未曾深入探讨的历史公案，它涉及到当时苏区领导人毛泽东等人的偏激路线，滥杀异己和无辜，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维护自己权力的目的。还有就是，“西安事变”的作用，该事变确实起到了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的作用。丁盛回忆说：“再像前面那样维持下去，当时对付胡宗南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物资方面，衣服、粮食的困难。……本来我们多困难啊！一事变，好了，胡宗南往后撤了，……所以说，‘西安事变’结束了我们艰难困苦的生活。”丁盛对“西安事变”前后形势的变化深有体会。由此可见，挽救红军和革命的最大恩人不是苏联或共产国际，而是张学良！若无“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再像以前那样发动对红军的围剿，中共日后的形势殊难意料。

二、不堪回首的“文革”疯狂年代

“文革”爆发时丁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自然也属于被造反派冲击，甚至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面对“文革”这样的乱局，丁盛表现出自己“大胆将军”独有的特性。

（1）宁折不弯。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丁盛不仅没有丝毫的退缩，反而与他们展开辩论，对造反派的指责、批判一一据理予以反驳。比如，造反派指责丁盛从四川来到新疆是为了夺权。丁盛反问他们“夺谁的权”，是夺陶峙岳（陶峙岳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的权吗？而这个陶峙岳恰恰无权可夺，因为陶峙岳是1949年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将领，虽然名位较高，可事实上并无实权。显然，造反派只会跟着中央文革鹦鹉学舌，对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由此显得文不对题，弄巧成拙。造反派还指责丁盛是罗瑞卿派到新疆的。丁盛反驳说“我是一个军人，他命令我来，我能不来吗？”对于丁盛的不合作，造反派也不得不承认“你的态度这么硬，动不动就跟我们吵。”

（2）坚持原则，绝不跟风。新疆造反派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要打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为此造反派多次纠缠丁盛将军，要求丁盛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丁盛坚决反对。丁盛一直认为，王恩茂等新疆的主要干部对新疆的建设是主要的，是有成绩的，如果他们有什么错误，可以批评或批判，为什么一有错误就要被打倒呢？面对造反派的逼迫，丁盛坚决不表态。丁盛直言：“我就不表态，我就不说打倒。你们要打倒，你们讲，叫我讲干什么？我为什么去打倒他？”对于军区内发生的武斗，丁盛坚决制止。对于那些企图冲击军队机关要局的人，丁盛严加制止。对于武斗中负伤的人员，即使是造反派一方的，丁盛也坚持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及时的救治。由于丁盛的努力，新疆没有发生大型的武斗事件。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丁盛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实为难能可贵。

（3）丁盛与林彪的接触。作为军队的主要干部，丁盛免不了要与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林彪有所接触。林彪在“文革”中对丁盛有过什么特殊的指示吗？据丁盛自己的回忆，他与林彪在“文革”时期只见过四次面，林彪对丁盛的指示就是要加强战备和军事训练。丁盛回忆说：“我跟他（指林彪）谈了以后，他讲了一下。他讲的内容，我简单记了……重点就是讲军事训练。”众所周知，1967和1968年正是“文革”搞得轰轰烈烈的时期，军队也不能幸免，军内造反派响应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号召在全军展开大批判，甚至要揪出一个所谓的“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不少军内的干部被批斗、斗倒、甚至斗死。林彪当时的策略就是要稳定军队，不使军队内部发生严重的内乱。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造反运动的支持，林彪并无可能与之对抗，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硬顶的策略，而是加强军事战备、军事训练，以军队要抵御外敌为口实，强调军队的特殊性以压制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以此迂回地抵制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插手军队，制造夺权的各种企图。以往的党史教材中，众口一词地说林彪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处心积虑地要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而丁盛的回忆恰恰否定了这一官方的说辞。

（4）揭示建房真相：为毛泽东修建别墅、行宫。林彪倒台后，中共官方就喋喋不休地指责林彪为了自己篡党夺权，私自在杭州为自己建立“行宫”——704工程，但却完全不提那是为了对付前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指挥所。真正为自己大建行宫的却是毛泽东本人。且不说三年大饥荒时期湖南为毛泽东兴建的“滴水洞”行宫，其他各地均有样学样，如武汉的东湖，杭州的汪庄、刘庄等。广州是毛泽东以前常来的地方，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1971年5月广州军区特派专人赴武汉和杭州，将毛泽东喜欢的房子样式记下来，动用两个团为毛泽东建行宫。不仅如此，在给毛泽东兴建行宫的同时，还要兴建多幢房子，主要是给周恩来、康生和江青所建。但是此处唯独没有给当时仍为二号人物的林彪建房，这充分说明，林彪那时已被毛泽东划入另册，出局了。毛泽东的家臣、贴身总管汪东兴多次前来观看、指导，为此还特别为汪东兴也加建一幢房子。对于给毛泽东建行宫，汪东兴可是费尽心机，提出各种要求，如走廊、卫生间、天井等，无不设想周到，工程也反复修改。不仅如此，广州军区还根据汪东兴的要求，从东北哈尔滨搞来四台电影放映机，专门配给这四幢房子。这个工程直到“913事件”之后才完工。可以说，这套工程完全是按照汪东兴的指示特别为毛泽东、江青、周恩来等人修建的，

但是“林彪事件”后却被当局诬指为是为林彪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而建，而此时此刻的汪东兴对此竟然沉默不言，连一句公道话都不说。丁盛气愤地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说这个房子是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你们定的，不是给林彪修的。不说话，广州军区相当一部分参加工程的人很愤慨，我也很愤慨。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账？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是中央副主席呀。”丁盛将军揭示出的事实真相，让人触目惊心，原来中共中央和专案组这些人就是这么不择手段地制造谎言，打击异己，由此制造出无数的冤案。

三、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被粉碎

（1）所谓的“林彪南逃”带给广州军区的灾难。“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建政后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冲击，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关系到党内、军内一大批领导干部。然而，就如同人们事后看到的，中共当局采取的依然是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制造了一大批冤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林彪有没有“南逃广州”？没有。林彪有没有主动与广州军区领导人联系策划过此事？也没有。如果真有此事，丁盛也早被打成林彪死党，撤职查办了。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实际上是专案组在“九一三事件”后罗织出来的，并无任何证据证实此事。“林彪事件”发生后，丁盛本人并未被打成林彪集团成员，依然受到中央的信任，并在1972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继续主持广州地区的军政事务。这实际已表明丁盛与突然爆发的“九一三事件”没有什么瓜葛。既然丁盛与广州军区并未卷入“林彪事件”，为何时隔几年后又大张旗鼓地追查广州军区，把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打成林彪死党呢？丁盛回忆说：“一次是1974年，第二次是1977年到1979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搞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1974年是王洪文、张春桥在北京硬逼丁盛承认事先知道林彪南逃。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各种卑劣的手段都使将出来，如封官许愿、威逼利诱，目的就是要广州军区承认他们事先知道林彪要南逃。丁盛气愤地说：“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如果说，1974年“四人帮”横行于世，可以随意制造冤案，可是到了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何中共还要继续追查广州军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制造这样的冤案呢？显然，邓小平的中央继续在林彪南逃一事上作文章，目的就是要将林彪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将文革的罪责转嫁到林彪与江青身上，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

（2）丁盛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不能被阉割。林彪倒台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批林而扭曲历史，丑化林彪。但是丁盛对此不以为然。丁盛在承认党中央指挥正确的前提下，公正地指出“林彪在东北的作用不能否认。我们很佩服林彪。来自各方面的人统一思想，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946年那么困难，打得敌人狼狈不堪。1947年东北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是事实。1947年秋季攻势把陈诚打败了。派了卫立煌，又打败了。这些功劳，林彪有一份，指挥是正确的，战略思想是对的……所以当时我们很佩服他，我个人很佩服他，这是事实。”丁盛还说：“我个人认为，林彪管理部队，战术思想，战斗作风很好。难道因为是林彪搞的，就不能用，就是错误的？军事科学没有阶级性。谁应用的好就胜利。”这些都说明，丁盛并不因为林彪被打倒就否认历史上的林彪，否认林彪的功劳和作用。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3）丁盛蒙难，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欲加之罪。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上，丁盛可以说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却在“四人帮”倒台后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四人帮”的势力。中共党史上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探讨的题目，即那些搞了阴谋诡计的人总是指责别人搞阴谋诡计，策划、实施了政变的人总是诬陷别人搞了政变。文革爆发前，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将军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让林彪、周恩来等人在政治局会上发表“防政变”的讲

话，制造紧张空气，还亲自调兵遣将，成立首都工作组，目的就是针对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依然故技重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自己的接班人林彪，诬指林彪要篡党夺权，并向地方诸侯大员打招呼，同时还在北京调兵遣将，最后将林彪逼上了绝路，可笑的是，林彪死后一个最重要的罪名竟然是“要搞政变”。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毛死后，继承了毛的整人衣钵，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一举抓获了“四人帮”。而“四人帮”的一个重要罪名居然也是“搞政变”。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华国锋的宫廷政变，历史走过了整整十年，他们斗倒政敌的利器竟然如此一脉相承，都是给自己的政敌戴上要“搞政变”的帽子，历史的演变何其相似乃尔。事实证明，恰恰是毛泽东和华国锋搞了政变。“四人帮”手中并不掌握军队的实权，即便“四人帮”的重点在上海，那里也只有一些工人民兵，这点民间武装实在微不足道，更无法威胁到北京的政局。既然华国锋等人要坐实“四人帮”搞政变，就一定要找出他们与军队方面的联系，罗织出“四人帮”要搞政变的证据，这样才能让真正搞了政变的华国锋等人自圆其说。而时任南京军区司令的丁盛正好成为华国锋等人现成的靶子。丁盛一条重要的罪名就是“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参加上海的武装叛乱”。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首先，林彪掌管解放军时是坚决地抵制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的，军队里的老干部在文革时期倍受冲击，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他们心底里极为痛恨这些文革极左派，林彪一系人马尤甚，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带头敲打张春桥，引发了老干部们的共鸣，群情激愤要揪张春桥就是明证，他们怎么可能投靠自己的死对头？

其次，丁盛历史上与“四人帮”素无瓜葛，1973年底才调任南京军区司令，与上海的“四人帮”党羽也没有任何往来，怎么可能忽然之间就“上了‘四人帮’的贼船”，且参与了“四人帮”策划的武装政变阴谋？

再次，华国锋等人给丁盛定罪的根据仅仅是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等几个人的口供，并无其他任何实际证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仅凭某个人的口供就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余汝信先生曾撰文《为丁盛辨》和《为丁盛辨（续）》，发表在“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增刊”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丁盛一案的原委，为丁盛将军作了有力的辩护。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徐景贤等人的口供根本就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伪证，徐景贤等人身为阶下囚不得不配合当局导演的戏码，遵循当局的旨意诬陷丁盛，他们日后当然不敢也不愿为丁盛作证推翻这些不实之证词。

最后一点，曾在广州军区工作多年的迟泽厚先生曾对此有过一些论述，迟先生说：“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迟先生后来又作了相应的补充，迟先生说：“1977年11月18日，除华国锋以外的几位军委主要领导人，曾集体接见广州军区领导，指示‘广州军区出了个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问题比其他单位多’，‘你们这里不是清水衙门，出了个黄永胜，又出了个丁盛，还有刘兴元，两个突出的，一个中间的’。而此时，被点名的这几个人，都早已不在广州，黄永胜、梁兴初、温玉成已调走10年，刘兴元已调走6年，调离广州军区时间最短的丁盛也已有4年。但是，账还是要算在广州军区头上。就在这次接见中，广州军区被定性为‘第十次和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重灾区’。既然是重灾区，自然要动‘大手术’。于是要求广州军区党委：打破顾虑，‘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怀疑，‘一开始怕打击面宽，问题就揭不出来’。可见要整丁盛，是上头的共识。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丁盛还能逃脱吗？”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谁是当时的“军内有力人士”呢？迟先生没有明说。但是知情人士告诉我们，所谓的“军内有力人士”就是当时掌握军权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在“二月逆流”后被毛泽东搁置长久不用，直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时被毛泽东密招上山，奉旨赴福建、广东收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资料，由此再次跻身中央政治圈，配合毛泽东打倒陈伯达的战略部署效尽了犬马之劳。回到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已经不像“文革”初期时那样敢于对抗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在许多事情上更是紧跟毛泽

东、江青、张春桥。诸如在1973年2月叶剑英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公然逼迫原广州军区副政委、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就“林彪事件”作伪证，明目张胆地强迫卜占亚承认“上了林彪贼船”和知悉、配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叶剑英这个政工元帅统兵打仗外行，玩弄政治却是一把“好手”！

四、新一轮的政治迫害

（1）专案组的逼供信。“文革”时期人们谈起专案组无不谈虎色变，他们往往秉承上级的旨意，罗织罪名，陷害无辜，疯狂地打击、迫害异己，成为毛泽东皇权专制体制里一个大搞政治迫害的工具，由此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专案组实已臭不可闻。然而这一违背现代法制理念的整人工具在“文革”结束后并未离开政治舞台，新的当权者不仅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加以利用，重新成为他们用以整人的利器，“专案组”竟然在此时得以发扬光大。1977年3月26日丁盛被停职审查，同年11月5日被专案组关押直到1979年4月14日。丁盛回忆说：“差不多两年时间天天搞，反正他们提什么问题，你不按他的要求说，不合他们的口味就顿脚、拍桌子，骂人。……两年时间，逼、供、信，一句话。”专案组利用各种手段折磨丁盛，如派两名警卫员全天候看守丁盛，寸步不离，连上厕所都陪伴在旁，晚上睡觉时在丁盛床头放两个大灯泡，让丁盛无法安心睡眠。关押期间，丁盛犯了心脏病，但专案组却不许丁盛看医生，更不许与家属会面。看管丁盛的警卫班战士也被勒令不许与丁盛讲话。十足的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1980年10月6日又将丁盛关押起来直到1981年5月9日。第一次关押是为了搞出丁盛与“四人帮”搞政变的证据，而第二次关押则纯粹配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丁盛的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出专案组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先定罪名，然后再通过逼供信的手段迫害当事人，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口供。

（2）株连的风暴。“文革”期间，凡被打入另册成为“阶级敌人”的人，其远近家属也无不跟着遭难，以至于无数的家庭惨遭株连的厄运。一人出事而株连九族乃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一个陋习，历朝历代习以为常。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搞株连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成为当权者迫害异己的得力手段，致使这一恶行大行其道，“文革”时期尤甚。“文革”结束后株连九族居然伴随着新一轮的政治迫害又一次在中国的舞台上耀武扬威。丁盛在1977年11月被关押审查后，丁盛的夫人和家属马上就被扫地出门，没有任何司法机关办的手续，更没有出示任何文件，如逮捕证、搜查证等，全凭上级口头命令就将丁盛一家赶出家门。当时全国还是凭票证供应粮油副食等，丁盛一家被赶出军区大院，竟然连基本的供应都没有了。丁盛的夫人重病，军区医院竟然不予救治，丁盛的女儿因丁盛的关系被下放到乡下的医疗队工作，丁盛重病时也不许女儿回家照顾，女儿在军区医院即将转为正式医生时竟然被强迫转业。丁盛的夫人为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丁盛气愤地说：“什么问题呢，从生活上折磨她，从政治上打击她，从经济上限制她。他们这样对她，不讲什么共产主义道德，还有人性吗？这是对她的折磨、对我的折磨。”由此可见，即使“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大搞株连的风暴依然无处不在、无孔不在。

（3）“两案审判”的荒谬。1980年中共中央搞的“两案”审判实际上在1978年1979年就在中央最高层开始酝酿，那时邓小平和陈云就打算将中共的党内斗争以司法的手段作了结。邓小平在1979年9月3日的党内会议上一锤定音：“有些人罪行严重，要判无期徒刑。黄吴李邱、陈伯达，可以作为一案，王张江姚，包括毛远新，作为一案，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人去写，要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写出来。”随后在1980年3月成立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担当主任，用以指导下面的检察院、法院的具体工作。这些人口头上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可检察院、法院犹如傀儡，检察官和法官的一举一动皆听命于这个上级指导机构的指挥，无一毫一息的独立性，“两案”涉及到的嫌犯早已被内定好了罪名和刑期，公开的审判不过就是走个形式，欺骗舆论和世人而已。“文革”时期的

中央专案组和后来成立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没有本质的区别，根本就是一脉相承，换汤不换药。他们在“两案”审理时又是怎样给丁盛定罪的呢？丁盛的罪名看起来很大、很吓人——“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参加上海的武装叛乱”。但是罪名之下居然没有任何实际可信的证据，全凭徐景贤、王秀珍几个人的口供，且这些口供也是靠逼供信制造出来。后来连专案组自己都觉得这套“罪证”实在拿不上台面，但为了给“四人帮”定罪他们不得不秉承“上意”，拿丁盛作陪绑，以期坐实“四人帮”上海搞武装政变的罪名。“两案”的审理在1981年初就告结束，可是过了一年半，直到1982年7月6日丁盛才被军事检察院宣布“免于起诉”，7月31日被宣布“开除党籍、退出现役”。随后丁盛以团级干部的待遇被赶到地方安置，每个月只给150元生活费，且不许住在沪宁铁路沿线，广州也不行，北京就更不能去了。最后只能被安置在江西的南昌。

以现代法学的观点来看，当年给丁盛定的罪名都是没有根据站不住脚的，当时的那么多法学专家、律师们难道都看不出来吗？参与“两案”审理的著名律师张思之后来来说：“如果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起诉书的话，我觉得拿不出手。作为共和国的第一大案、要案，代表国家对于你指控的被告人来起诉他的罪行，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来，我认为太不够了。那更谈不上审判以后官方总结所说的，这些文件具有什么‘典范的意义’，不可以这样讲。”张律师进一步说：“那更明显的就是最后的判决。谁定的？常委定的，不是法庭定的。江华敢定吗？他定得了吗？尤其是在判不判死刑这个问题上，那是翻来覆去多少过儿。这些都说明，‘两案’审判是党的审判，是党的政治审判，而不是真正准确意义上的一次法律审判。”具体到丁盛一案，那正是由于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罔顾事实，强加罪名，伪造事证，有意扼杀丁盛的政治生命。

（4）“一腔悲愤谁诉？”面对邓氏年代如此不公不义的行径，丁盛没有被压垮，而是到北京申诉。丁盛先后找了中组部、中纪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但是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不能谈”，理由是“为了稳定局面、为了安定”，只有生活问题可以谈一谈。具体到“两案”审理中处理过的案子，都是同样的命运。接待丁盛的人直言不讳：“现在凡是‘两案’，就是林彪一案、江青这个案，过去办了的，处理了的，处理对了，不要动了；处理错了，也不动，就错了；处理轻了，也不动，就轻了；处理重了，也不动，就重了。对也好，错也好。轻也好，重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压死了。”他们劝丁盛想开一点，“你这种情况不是你一个人，是一批人。”丁盛后来还找了当时硕果仅存的聂荣臻元帅，聂帅则批给总政处理，但邓小平在军委掌权的行走刘华清竟然不屑一顾地说“管这个闲事干什么？”一副邓氏走狗奴才相。事实上，从有关部门的反应来看，他们并非不知道受“两案”审判无辜牵连的大有人在，且大都含冤受屈，但是这是邓小平一人定下来的，即使明明不对，确确实实搞了冤案的，也无法得到澄清和改正，且美其名曰“为了稳定”，其实说穿了就是为了邓小平一人，这就是典型的皇权专制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又一翻版，只不过过去姓毛，现在转而姓邓而已。丁盛的申诉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是却暴露了这伙邓氏伪君子们任意制造冤狱的真面目，也让人们更加认清他们的丑恶本质。

五、猛士悲歌唱大风

丁盛将军虽然去世已十年，但是每当读起他的回忆，都能深刻地体会到丁盛将军所具有的英雄气概。丁盛将军的回忆不拖泥带水，不转弯抹角，言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闻其声如见其人，句句话如同重锤敲击在人们的心头，不愧是枪林弹雨打出来的真英雄、真豪杰。

现今那些仍然以毛泽东是非为是非的人，以党的决议为判定真理和谬误的人，依然不敢触动那些敏感话题。丁盛将军在回忆里直接批判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谬误。丁盛说：“1971年8月，在长沙，毛泽东指着我说：‘丁盛、刘兴元，你俩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你说我们跟

他的关系密切。那你跟他的关系不密切啊？你们从井冈山一起下来。他当总长是我们让他当的吗？不是你毛泽东、周恩来，你们中央叫他当的？……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责怪我们，把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你怎么不讲自己用错了人啊？‘九一三’以后，打击了多少人啊！”对当时中央里的某些领导人，丁盛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虚伪。丁盛说：“华国锋为什么搞我呢？因为我不支持他搞卜占亚。1972年下半年，华国锋要整卜占亚，说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我说不知道卜占亚有什么事，我揭发什么呀？所以华国锋就记下这个仇恨。”针对汪东兴，丁盛说：“汪东兴是为了表现。在江青跟前的时候，跟江青说话，腰都挺不起来，江青同志这样、那样的。你叫我们接待江青，给我们交代那么具体，那么明确，三番五次地讲。等江青倒台了又反过来说，江青在海南岛打高射炮，你丁盛知道不知道？你安排了任务，完了又说我们投靠了江青，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对于邓氏中央强加在丁盛身上的罪状，丁盛坚定地说：“这全是一个冤假错案。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定，你们没有证据，一件证据也没有。”丁盛最后理直气壮地说：“从我本身来讲，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我没有作坏事，我问心无愧，理直气壮。”

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在人民心目中，侠士、勇士、猛士也得到更多的尊崇和敬佩。抗金英雄岳武穆虽然为当朝者害死，但其英勇事迹和那一曲满江红却长留人间，成为永久的英雄象征。丁盛将军以其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卓越战功无愧于“猛士”这一称号。虽经“文革”的磨难和邓氏年代不公不义的迫害，丁盛毫不妥协，不退缩，而是据理力争，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丁盛将军身后这部回忆录犹如悲壮之歌狂飙一曲从天落，这番壮怀激烈必将记录在那真实的历史中。笔者相信，丁盛将军不会永远沉冤海底，毕竟历史是人民写的，而非统治者所能任意歪曲和篡改的。

~~~~~

## 【书刊评论】

革命？还是帝王政治的回光返照？

——Mao's Last Revolution 评介

• 董国强 •

现在已过不惑之年的当代中国史学者，一定不会忘记1989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第二卷中文版出版发行时的盛况。从那时候开始，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便成为一个令我景仰的学者。此后我一直期待着读到更多他的著述，特别是直接关于“文革”的著述。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越来越多，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避之惟恐不及，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中文翻译引介工作也几近停顿。所以麦氏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英文版于1998年推出以后，我没有看到国内学界的任何反响，更不用说翻译出版了。

2005年以后，一些偶然的因素促成我将个人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文革”。在此期间，我遇到麦氏的得意门生、美国Furman大学的历史和东亚学教授杨凯里（Jan Kiley）先生。他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后，便热情地向我推介由麦氏和Michael Schoenhals共同撰写的关于“文革”的新著Mao's Last Revolution。由此，麦氏的著述又一次进入我的阅读视野。

在与一些美国学者的交往中，我不止一次地听说，对于那些十分注重理论、概念和话语（学术意义上的Narrative）的西方学者而言，记者出身的麦氏似乎是一个异类。这次有机会重读麦氏的著作，我对此才有更深切的体会。此书长达693页，是一块名副其实的“砖

头”，但其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研究理念和方法论的讨论，也没有佶屈聱牙、令人费解的概念阐释和专业术语。就连本应带有些许理论色彩的“介绍”和“结论”部分，也以叙事而非理论分析为主。如果套用中国传统的史学分类方法，我们大致可以将这本书定位于“纪事本末”体裁（当然书中所记述的大事，大体按时间的先后排序，能够反映“文革”的基本走势和整体面貌）。在当今学界趋新若鹜的学术氛围下，该书能以传统的体裁赢得广泛的赞誉，实有赖于其内容的丰富和麦氏们天才的叙事技巧。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麦氏在哈佛开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课程时，会受到那么多哈佛学子的追捧。

然而，出色的叙事技巧只是这本书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学术评价的观点看，历史学家的故事是否值得称道，关键还在于这些故事是否真实，是否能给人以教益。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麦氏们研究著述的目的显然不在哗众取宠，而在于探究历史的真相。因而他们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奇闻逸事的搜寻和故事情节的编排上，而是放在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校勘和正确解读方面。为此他们积数十年之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领袖人物传记、个人年谱资料和各种类型的大事记，大量的回忆录作品、中央领导人谈话记录和“红卫兵”出版物，以及一些因种种原因流散于民间的官方档案资料。同时，他们对现有关于“文革”研究的论著作了一番认真的梳理，因而对学界的研究现状了如指掌。据我粗略的统计，该书共有注释1,962个，所引证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多达813种。其中既包括我们熟知的一些大陆著名学者的论著，也包括一些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英文论著，如裴宜理等人关于上海工人造反运动的研究、王绍光关于武汉“7·20事件”的研究、金秋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等等。由此可见，这本书之所以有价值也有趣味，是因为作者在详尽占有原始资料和研究资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一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独到眼光，将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各种戏剧性因素发掘出来。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也正是历史学的持久魅力所在。

其次，既然历史学命中注定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偏见的影响，因而，如何使主观性偏见的影响降至最低，始终是严肃的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麦氏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从他们对资料的运用上略见一斑。例如，他们在书中指出，“文革”期间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常常会有若干不同版本流传于世，经过官方修订以后正式公布的讲话稿往往会出于种种考虑对其原始内容作一些增删，而一些个人保留的现场速记版本则没有这种缺憾。因此，他们在著述时尊重官方正式公布的文件，但有时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用他们认为更原始、更可靠的资料来源（第480页）。再如，一般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印行的各种“红卫兵”出版物是研究“文革”的重要史料。不过麦氏们在书中指出，“红卫兵”出版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用来宣传各派观点的、充满派性话语和偏见的宣传类刊物；第二类是各派内部小范围发行的、供其头头们决策时参考的、比较客观地介绍各地运动动态的情报类刊物。他们在著述时尽量减少对前者的依赖，而更多地采用后者（第481页）。以我个人经验看，上述两点常常被其他学者所忽略。

再次，该书从整体上看以展现中央高层内部关系为主线，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有相当的篇幅展现各地局势的发展，以及一些普通民众的日常政治生活及其内心感受。这种“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有效地突破了传统党史研究中的“文山会海”模式，同时摆脱了狭隘的上层权力斗争的解释窠臼，使我们不但对高层决策的动机和过程有所了解，而且也对一些重大决策的贯彻实施及其实际社会影响有所了解。例如，“文革”期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迫害，有多少人致死致残，迄今为止是一笔糊涂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Andrew Walder作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对公开出版的中国1,500县的县志资料的统计分析，他推断出“清队”期间全国范围受到迫害的人数大约为3,600万人，其中被杀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另有大致相等的人数因遭受虐待导致终身残疾。麦氏们在书中引用了这项研究成果来说明“文革”对社会和民众的危害（第262页）。相信类似的方法今后可能会被更广泛地应用。

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之外，作者对“文革”史实的描述和分析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择要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既然这本书以Mao's Last Revolution冠名，其中描写得最充分、最出彩的，当然还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我记得麦氏曾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断言，毛时代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新王朝。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的行文中虽然没有突出地强调这一点，但在作者对具体史实的细致描述中，我们似乎很难发现“革命”的踪影，相反倒是对毛时代中国政治的宫廷化色彩和毛本人的帝王做派印象深刻。毛泽东的韬晦之深是令人惊诧的。例如，在“文革”发动阶段，连深得其信任的张春桥、戚本禹和康生都不知道，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竟然是指刘少奇（第47—48页）。而他的枭雄本色则突出地表现为，直到其去世之前的最后一刻，他都牢牢地控制着权力。尽管叶剑英等人早有铲除江青一伙的想法，但在毛泽东咽气前决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该书的叙述表明，“文革”期间宫廷化政治氛围的形成，不但与毛泽东的帝王做派有关，而且与其同志们的廷臣心态有关。麦氏们在书中将中共高层干部划分为“幸存者”、“受益者”和“急进派”三个群体。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到，尽管上述三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竭力逢迎毛泽东（working toward Mao）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然而，深谙帝王御臣之术的毛泽东绝不轻易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有时还会故布疑阵以考验其下属的忠诚。在此背景下，对于那些担当重任的党政军要员而言，政治活动便从整体上堕落为一种“猜谜”和“赌博”的游戏。他们不是将更多的时间和心思用在处理实际问题，而是用在打探和揣摩毛泽东的“圣意”上。这种政治实践可能带来怎样的政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这种廷臣心态的形成可以理解，对那些因猜错毛泽东意图而受到清洗、或者当时猜对了但事后被当作替罪羊受到清洗的人也怀有一定的同情，但他们客观上都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所以也应该对“文革”承担一部分历史责任。

第三，“文革”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亿万普通民众被卷入其中。因此，如何解释和评价“文革”期间的民众政治参与，是每个“文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在那个简单化、概念化的解释体系中，“‘文革’=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群众运动”。这种解释一方面大大规避了毛泽东个人和斯大林体制所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迎合了新权威主义的政治需要。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所提供的大量生动事例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固然不能无视无序的群众运动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从根本上讲也是working toward Mao的一个结果。其次，自发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比起有组织的国家暴力所实施的大规模整肃，乃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文革”期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不是发生在“造反派”主导的“造反”、“夺权”阶段，而是发生在中央领导层试图逐步收缩群众运动的阶段。群众性武斗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升级，发生在各地军队以“三支两军”名义介入地方事务以后。而各省普遍实现“大联合”以后，自上而下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5·16”运动所造成的死伤，又是“军管”时期无法比拟的。由此可见，将“文革”动乱和危害完全归咎于“造反派”是多么地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国内外一些“新左派”同仁出于思想的偏见和历史的无知，依然在喋喋不休地阐释“文革”运动的进步意义。事实上，“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中国封建政治理念与实践的一种极端表现。从中央高层的内部关系看，导致“文革”悲剧的主要根源是毛泽东无法容忍党内外不同意见。从社会范围看，导致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等级制、社会不公和干部特权腐败。持续十年的“文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上述问题。相反，在毛泽东个人集权与个人崇拜方面，“文革”时期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等级观念和特权腐败问题，无论是在

“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身上，还是在通过“纳新”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领袖身上，还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复出的老干部身上，都有许多具体生动的体现。“文革”期间出现的若干过渡性权力机构，无一不以所谓“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而各级机构“一把手”的任命，又无一例外地要以对毛泽东的个人效忠为第一要务。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我实在看不出任何一点“革命”的意味。

我认为某些“新左派”观点的形成，可能与他们对某些事实的错误判断有关。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提供的许多事实表明，个人独裁政体的实际运作是一个十分复杂微妙的过程，独裁者的政治影响力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批示会立刻改变事态发展的走向，但是这种改变是否完全如毛泽东个人主观所愿，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7·20事件”前夕，毛泽东亲临武汉，原本是希望通过其个人的直接干预，促成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为全国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一个样板。没想到，由于现实政治环节的错综复杂，毛的非制度性干预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当地的事态极度恶化，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仓皇上演了“夜奔”一幕。再如，张春桥是毛泽东晚年属意的接班人之一，他曾在许多场合对此做出过暗示。但在1976年初邓小平被罢免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委派张春桥主持大局，而是选择了华国锋。这说明，即使大权在握，毛泽东的政治抉择也并非完全随心所欲的。他必须时刻注意保持各派政治势力的微妙均衡。由此可见，独裁政治的权力基础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类似的情节多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外历史上强势君主荣耀光环背后所隐藏的个人苦衷，以及他们在英雄迟暮之年的所作所为何以荒诞多变。

以上各点构成我向大家推荐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的主要理由。

如果说该书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是麦氏们似乎过于强调了中苏意识形态论争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内在关联。我认为，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行动人物”而非“观念人物”。他更关心的是现实的权力归属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对错问题。因此，如果说“苏联问题”会对毛泽东个人产生刺激的话，恐怕也不是中苏论战中所标榜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和勃列日涅夫等人通过阴谋手段罢免赫鲁晓夫这两个具体事件。换言之，毛泽东之所以下决心清洗刘少奇，是因为他担心刘少奇步勃列日涅夫的后尘抢班夺权，或者是步赫鲁晓夫的后尘在毛死后做“秘密报告”。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说最初的“文革”其实只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政变”，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且，在我看来，当时，不管是否存在外部刺激，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都是无法避免的。从根本上讲，这不是个人品格和能力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政治的宿命。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